8月以来日本首都圈已发生14起类似案件均与“网络黑工”密切相关

日本警方提示民众防范“匿名流动型犯罪”

□ 本报记者 苏宁

连日来，多起与“网络黑工”相关的恶性案件引发日本社会高度关注。8月以来，仅日本首都圈就发生14起类似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犯罪分子以提供高额报酬为诱饵，通过社交网络招募青少年，再胁迫他们实施抢劫等犯罪。日本警方将此类案件命名为“匿名流动型犯罪”。

日本法律界人士指出，由于幕后主谋匿名通过网络遥控指挥，被逮捕、起诉的大多是依照指令到现场实施犯罪的青少年。而且，通过网络临时招募青少年打“网络黑工”，隐蔽性强、流动性大，后者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比起惯犯更易发生极端行为。目前，日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与埼玉县已成立联合行动本部，采取专项应对措施。

接连发生多起案件

综合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日本接连发生针对民宅和店铺的入室抢劫案件，且都与“网络黑工”密切相关：9月10日，东京都练马区发生劫持监禁致伤案件，受害人被5人殴打劫持并被监禁5小时；10月9日，千叶县船桥市发生抢劫案件，两高龄夫妇遭入室抢劫，妻子受重伤，900万日元现金被劫；10月15日，横滨市青叶区发生抢劫杀人案件，受害人在家中遇害，20万日元现金被劫；10月16日，千叶县白井市发生抢劫伤人案件；10月17日，千叶县市川市再次发生劫持监禁致伤案件，受害人在家中遭3人殴打，并被胶带捆束后用车劫持，警方虽于当日解救出受害女性，但其全身遍布伤痕、肋骨骨折。

上述案件中的嫌疑人在被捕后不约而同地供述出共同的经历：应聘了“网络黑工”。

涉嫌15日在横滨抢劫杀人的嫌疑人宝田真月（22岁）供述称，他在作案过程中一直通过网络通信工具与发指令的人保持通话，作案对象也系指令人指定的。他还供述称，由于欠了数十万日元的税务滞纳金，为赚快钱而应聘了“网络黑工”，虽然中途察觉是犯罪，但由于已向对方提交了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担心遭到报复，还是选择铤而走险；17日被逮捕的涉嫌参与多起类似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藤井在供述中也表示自己应聘了“网络黑工”；另据23日被逮捕的两名嫌疑人供述，他们也是应聘“网络黑工”后，依照指令于14日凌晨侵入镰谷市一处民宅，但因惊醒住户而逃走。

据报道，上述案件均疑似由自称“织田信长”的主谋通过网络通信工具幕后指挥。该人使用多个账号和用户名，通过发布“网络黑工”广告召集青少年充当“执行人”实施犯罪。目前，上述案件中已有30多人被逮捕，但幕后主谋仍然逍遥法外。

日本法律界人士担心，随着首都圈打击犯罪的力度增大，类似犯罪极可能向外地扩散。实际上，10月20日，在远离首都圈的山口县光市也发生了入室抢劫未遂事件，3名14岁至18岁的中学生被逮捕。据警方初步调查，3人素不相识，但均与“网络黑工”有关。

幕后操控危害更大

由于上述案件的共同点是犯罪主谋利用招募“网络黑工”为由头挑选实际“执行人”实施犯罪，具有匿名性、流动性的特点，日本警方将此类案件命名为“匿名流动型犯罪”。

据警方透露，从部分案件的指令来自同一通信软件账号分析，存在一系列案件的幕后主谋为同一犯罪团伙的可能。

警方还在调查中发现，在不少案件中，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已经知晓受害人的家庭情况及财产情况等个人信息。广岛大学犯罪学教授吉中信人指出，独居者、女性易成为“匿名流动型犯罪”的目标，“执行人”往往采取强行破窗入室等简单粗暴的手段。此外，犯罪集团有时会事前踩点，比如假冒家装公司或销售人员搜集房屋格局、家庭成员构成、空宅时间段等信息。

另外，也有一些案件显示，犯罪分子也可能利用从黑市购买的个人信息选择作案目标。日本社会中存在贩卖个人信息“黑色产业链”。学校、公司、医院的“内鬼”将个人信息数据资料卖给中间商，几经转手后，个人信息最终落入犯罪团伙手中。

日本犯罪社会学者广末登指出，黑市购买的个人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犯罪分子无法精准选择作案对象。但是，由于幕后主谋深藏自身信息，并不担心“执行人”被捕，因此在作案前并不会精心设计，而是选择逼迫“执行人”疯狂连续作案。“执行人”往往是在实施犯罪前短时间内临时“组队”，实施犯罪后迅速“解散”，“执行人”之间互不相识，随机性大，增大了预防和调查难度。

法律界人士指出，由于犯罪主谋躲在幕后，并不在现场，有恃无恐，更易导致恶性犯罪。比如，有的“执行人”供述，指令人会要求“打（受害者）很多次，甚至杀死目标”等。如果拒绝或犹豫不决，就会被威胁“会遭遇不幸”“家人也不会好过”，并被告知其“背后是（反社会）组织”。

成立联合行动本部

目前，面对“网络黑工”引发的“匿名流动型犯罪”频发的严峻局面，日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与埼玉县已成立联合行动本部，采取专项应对措施。

不仅如此，针对相关案件高发态势，10月22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听取警察厅相关负责人报告后表示，针对“网络黑工”犯罪要加强对民众宣传教育，强化报案咨询渠道机制，如有必要将增加补充预算，强化应对措施。

近日，日本警察厅通过YouTube等社交平台发布短视频，教育民众抢劫是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即使自身及家人受到胁迫，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参与犯罪，呼吁民众要有勇气第一时间报警。

此外，日本警察厅通过官网向民众发出“网络黑工就是招募犯罪执行人”的警示。日本警方还提示民众，尽可能采取措施加强家宅的安全防范，如加装监控摄像头、完善门窗锁具、及时清空邮箱中的印刷品等，防范近期多发的“网络黑工”引起的“匿名流动型犯罪”。

10月22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听取警察厅相关负责人报告后表示，针对“网络黑工”犯罪要加强对民众宣传教育，强化报案咨询渠道机制。图为石破茂参会时向现场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多重因素叠加 尹锡悦支持率暴跌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连日来，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跌至两成，创下历史新低。有分析认为，经济低迷、民生困顿，外交失策等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上任两年半的尹锡悦支持率暴跌。一组组民调数字，宛如一记重锤，给尹锡悦政府敲响了警钟，使得其不得不反思任期内的各项政策。

支持率仅为22%

韩联社10月24日报道称，“韩国调查”等4家民调机构当天发布的针对1000名18岁以上韩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尹锡悦支持率仅为22%，比两周前进行的类似调查下跌2%，创下这4家民调机构进行的类似调查的最低值。其中，认为尹锡悦政府“做得不好”的民众高达67%，此外有65%的民众表示“不信任尹锡悦政府”。

在政党支持率方面，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28%，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30%，祖国革新党支持率为8%，改革新党支持率为3%，另有29%的受访民众表示不支持任何政党。

民调机构盖洛普10月18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为22%，差评率为69%。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是政治倾向保守的韩国民众（执政党支持者），也仅有38%的受访者认为尹锡悦政府“执政良好”，超过半数（56%）受访的政治倾向保守民众认为尹锡悦政府“做得不好”。

一落千丈事出有因

分析人士认为，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不仅对尹锡悦的声望造成沉重打击，也给尹锡悦政府剩余任期的执政带来难题。

韩国国内有声音指出，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尹锡悦支持率一落千丈。经济低迷、民生困顿，无疑是导致尹锡悦支持率下滑最重要的因素。曾经的“汉江奇迹”似乎已成明日黄花，取而代之是高企的物价、低迷的就业市场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回顾尹锡悦当选的时候，韩国民众也曾期待他能够在任期内带来崭新的政治气象，为陷入停滞的韩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最新民调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分析。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有15%的人将“经济、民生、物价”列为对尹锡悦政府支持下滑的首要原因，其他原因有：“第一夫人金建希腐败疑云”（14%）、“（政府）欠缺沟通”（8%）、“整体施政不良”（7%）等。

除此之外，“失败的尹锡悦式外交”也成为韩国各界质疑的对象。

“（由于）失败的尹锡悦式外交，韩国被推向阵营对立最前线。”《韩民族日报》10月21日在社论中表示，随着尹锡悦政府执政两年半以来推行的带有偏向性的“价值观外交”，韩朝关系已演变为“敌对的两国关系”，韩国历届政府一直以来推进的与朝鲜的外交成果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韩国被逼入阵营对立的“最前线”，这是最近三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局面。

社论认为，虽然为时已晚，但有必要对尹锡悦政府一直以来只专注于通过“价值观外交”加强韩美日军事合作的外交路线进行冷静反思。

“无罪”认定引发不满

在尹锡悦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之时，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所牵扯的多项争议令尹锡悦愈发难以从困境中脱身。

实际上，关于金建希涉嫌犯罪的争议一直存在，但最近韩国检方的一则“无罪”认定引发韩国社会的不满情绪。10月17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反贪二部针对金建希涉嫌参与操纵德意志汽车公司股价案作出不起诉决定，认定其“无犯罪嫌疑”。检方称，经过调查，认定金建希不具有违反《资本市场法》的犯罪嫌疑，这距离韩国在野党2020年4月控告金建希涉嫌参与操纵股价约过了4年半。

针对这一决定，不少韩国媒体提出强烈质疑。韩国《中央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指出，在历经长达4年半的调查后，首尔检方作出金建希等人无罪的决定，但从韩国国民的角度来看，仍有很多难以接受的地方。社论进一步指出，尽管金建希在上月的名牌包收受案和此次的股票操纵案中均未被起诉，但相关争议不仅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甚至“火已经烧到尹锡悦身上”。

在10月21日举行的尹锡悦与执政党党首韩东勋的会晤上，金建希问题成为议题焦点。韩东勋提出三大建议，分别是总统室重整幕僚班子、金建希积极协助查清自身牵涉的疑窦、金建希暂停公开活动。

盖洛普分析认为，金建希牵涉的争议无疑给尹锡悦的支持率带来显著消极影响。这家民调机构还根据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大部分受访者实际上支持组建独检组调查金建希相关腐败疑云。

在尹锡悦政府任期内，多项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引发民众不满。图为在韩国首尔市中心，民间团体手举标语举行集会，抗议韩美联合军演。

新华社发

立法动态

英议会审议新版《就业权利法案》

10月21日，英国议会二读审议新版《就业权利法案》。这一法案将保证工人从就业第一天起就享有新权利，包括：病假工资、免遭不公平解雇的保护、育儿假和丧假。新法案还提议禁止所谓的“剥削性”零时合同，并加强工会权利。根据拟议的立法，目前使用零时合同的雇主必须和员工签署每周固定小时数的工作合同。这将根据工人在12周内的平均工作时间计算。英国政府认为，这项法案是“这代人对工人权利的最大提升”。不过，一份政府部门发布的经济评估报告分析认为，工党提升工人权利的计划每年将使企业承担高达50亿英镑的额外成本。报告警告说，额外的企业成本可能会导致雇主裁员，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来自保守党的影子商务大臣凯文·霍林雷克认为，政府应重新审视其“扼杀增长的法案，至少要让中小企业免受这些灾难性措施的影响”。

阿国会通过新法案减少贸易壁垒

近日，阿根廷国会通过27766号法案，正式批准《南方共同市场贸易便利化协定》。这一协定于2019年在巴西签署，旨在简化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海关手续，提升国家间的合作，减少外贸中的贸易壁垒，进而增强区域竞争力。专家表示，该法案的生效将有效缩短外贸交易的时间和成本，特别是对阿根廷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带来积极影响。根据法案内容，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将共同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应用数字技术优化海关流程、实施基于风险管理的海关检查，并提升国家间系统的互操作性。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会加速商品在南方共同市场内的流通，还将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长期存在的外贸物流瓶颈问题。阿根廷和其他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将更好地适应全球市场的需求，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贸易的发展。

日新版道路交通法将于11月生效

据《日本时报》近日报道，日本最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法将于11月1日生效。新规对骑车的相关违法行为加以细分并加大处罚力度，届时骑行者或因看手机（使用免提设备通话除外）、酒驾等违法行为面临高额罚款和监禁。据日本现行法规，各地对骑行时使用手机的顶格处罚为5万日元，而新规对骑行时拨打电话、发短信或只是盯着手机屏幕，将处以最高10万日元罚款或6个月监禁。若骑行者因此造成事故，处罚将提升到最高30万日元罚款或一年以下监禁。此外，新规首次将酒后骑车也列入违法行为，对应处罚为最高50万日元或3年以下监禁，且协助酒后骑行的相关人士，例如为酒驾者提供自行车和饮酒的人，也将受到连带处罚。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不少民众将改善骑行环境的希望寄托在新规上。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珞珈法治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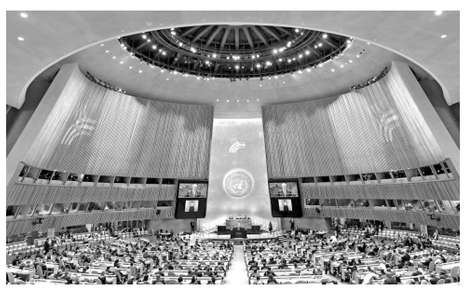
打破西方霸权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

□ 周晓明

近年来，全球治理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显现。然而，与其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仍然严重不足。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通过掌控国际组织、设定全球规则和主导舆论，形成了制度性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不仅维护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抑制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和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打破西方的制度性话语霸权，是提升全球南方制度性话语权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更公平的全球治理的首要问题。

制度性话语霸权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通过掌控国际组织、规则体系以及议程设置，构建和维护一种有利于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全球话语体系。这种制度性话语霸权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体系，包括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国际法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和解释、全球媒体和文化传播的控制等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掌控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权。西方国家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权力分配、机制架构、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等手段操控国际组织，以确保其在国际组织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不仅控制了全球资金的流动，还通过不平等的投票权制度，确保自身的金融霸权。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西方国家通过把控议程设置，推动了自由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发言权，确保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制度化推广。在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发达国家通过谈判和制度化的议程控制，在农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确保本国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则往往被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是全球南方国家长期争取的目标，尽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但西方国家利用其投票权阻碍了投票权重新分配的进程，维持了现有的不平等格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西方国家通过选举规则和议程控制，确保其主导的人权议题占据全球讨论的中心，弱化了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经济社会权利等非西方主导议题的讨论。



图为在9月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指出，全球南方的声音应当被听到。

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其次，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法规范和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解释。国际法规范和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是西方国家维持其制度性话语霸权的重要工具。通过主导国际法规范和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和解释，西方国家将其利益嵌入全球法律与技术体系，迫使全球南方国家遵循西方主导的规则和标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法基本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达国家推动了严格的保护制度，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提供制度保障，对依赖技术进口和发展国内创新能力的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让和自主创新方面的能力。

西方国家不仅主导国际法规范的制定和解释，还通过主导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和解释，确保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长期主导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标准制定。在5G通信技术、互联网协议等新兴技术领域，西方国家利用其技术领先优势，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标准成为全球通行的规范。这种标准化的主导权不仅让西方国家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还进一步限制了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机会。在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领域，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法律框架，设定了全球数据隐私保护的标准。这些标准虽然看似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但实际上加强了西方国家对全球数据流动的控制，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遵循这些标准时面临技术和经济上的挑战。这种通过技术标准实现的制度性话语霸权，进一步限制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自主发展能力，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此外，西方国家拥有对全球媒体与文化传播的控制权。西方对全球媒体与文化传播的控制权是其制度性话语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全球主流媒体、文化产业以及数字传播平台的主导，西方国家能够影响全球公众的认知、塑造国际舆论，并推广其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软实力来维护西方的全球领导地位。西方国家拥有众多全球性的新闻媒体，如CNN、BBC、路透社、《纽约时报》等。这些媒体不仅是国际新闻的主要发布者，还设定了全球新闻报道的框架和叙事角度。例如，在报道发展中国家时，西方媒体常常突出贫困、战争和腐败等负面形象，回避对发展中国家正面的发展成就的介绍。在涉及国际冲突、政治危机和人权等议题时，西方媒体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构建特定的叙事框架，将西方的立场合法化、正当化，将非西方国家的声音边缘化或负面化。这种选择性报道不仅加深了全球南北之间的理解鸿沟，也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的文化话语霸权。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都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所掌控。这些平台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还通过算法和内容审核规则，影响信息的可见度和传播范围。西方国家的搜索引擎（如Google）、新闻聚合平台及其他信息服务商，通过其内容推荐系统和信息检索控制全球用户能够接触到的新闻和信息，优先展示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非西方国家的声音，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立场相左的内容，往往会被边缘化甚至屏蔽，从而进一步巩固西方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还通过主导全球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其制度性话语霸权。欧美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被鼓吹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中心，西方国家掌控大部分顶尖的国际学术出版物和期刊，控制全球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全球范围内设定科学和学术研究的标准，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在这些平台上的展示机会有限，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学术界的话语权。

通过上述手段，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法律与技术标准、全球媒体和发展援助中构建了复杂且有效的制度性话语霸权，深入到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多个领域。这种话语霸权不仅限制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也加剧了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因此，打破西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霸权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首要任务，更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和公平化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教育部法治国际组织联合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教授）